

财

经

HOUQIGUO GONGYEHUA YINLUN

后起国工业化引论

——关于工业化史与工业化理论的一种考察

史东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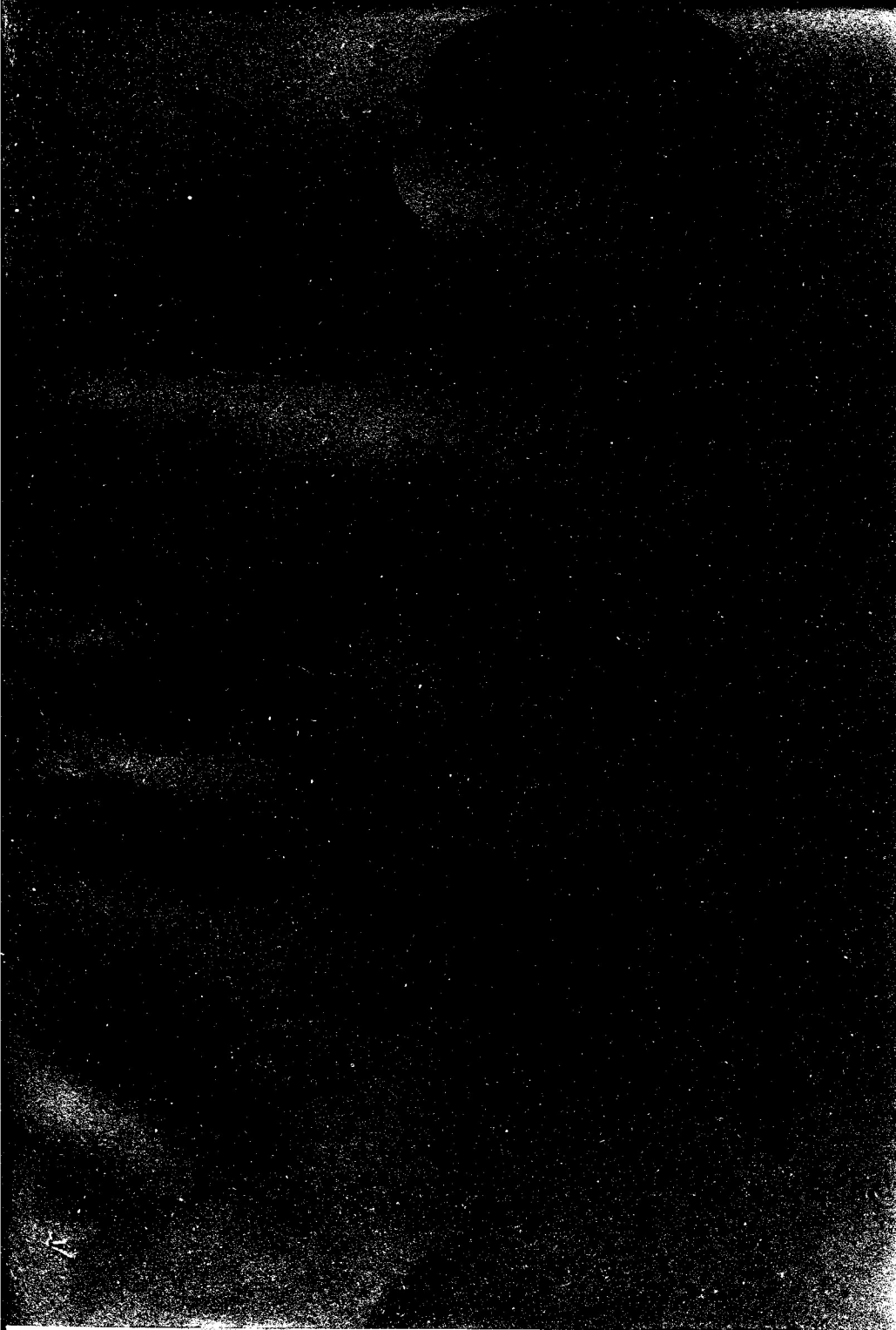
学

术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义

库



后起国工业化引论

——关于工业化史与工业化理论的一种考察

HOUQIGUO GONGYEHUA YINLUN

——GUANYU GONGYEHUASHI YU GONGYEHUA LILUN DE YIZHONG KAOCHA

史东辉 著

责任编辑 程肖芬

封面设计 周卫民

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行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	
装订	850×1168mm	1/32
开本	7.75	插页 2
印张	194	千
字数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1—3	000
印数	ISBN 7-81049-268-3/F·217	
书号	15.50 元	
定价		

目 录

1 导言	(1)
1.1 现象与问题.....	(1)
1.2 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6)
1.3 基本思路与方法.....	(12)
2 工业化是什么	(19)
2.1 工业化的涵义.....	(19)
2.2 工业化与工业.....	(29)
2.3 工业化中的国家兴衰.....	(36)
2.4 制度创新与工业化.....	(43)
3 后起国工业化的一般逻辑	(51)
3.1 后起国与后起性.....	(51)
3.2 格申克龙及其后起之益说.....	(58)
3.3 从历史角度看后起之益.....	(65)
3.4 赶超：后起国工业化的必然逻辑	(74)
3.5 成功的赶超历程：经验与比照	(83)
4 国际环境与后起国工业化	(94)
4.1 工业化中的国际竞争.....	(95)
4.2 后起国工业化的国际环境	(103)
4.3 工业化理论中的国家与国家利益：若干评论	(113)

4.4	从贸易保护到自由贸易	(123)
5	后起国的工业化战略:经验与问题	(134)
5.1	后起国工业化战略的历史背景与特征	(134)
5.2	国际环境对后起国工业化战略的制约	(144)
5.3	产业结构转换的经验与陷阱	(154)
5.4	跨国公司、民族工业与后起国工业化	(165)
6	技术进步:后起的模式与陷阱	(174)
6.1	后起国技术进步的理想模式	(175)
6.2	引进与模仿的恶性循环	(182)
6.3	市场能换来多少技术	(191)
6.4	难以打开的机会窗口	(199)
7	从历史角度看后起大国的工业化	(208)
7.1	工业化中的大国与小国:有关学说的回顾与评述	(209)
7.2	国际竞争中的后起国工业化	(219)
7.3	后起大国工业化的空间限制:一个假说	(229)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3)

1 导 言

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

——孙中山^①

1.1 现象与问题

1.1.1 九死一生的中国工业化

自 18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化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各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推动国家工业化,尽可能快地实现国家富强,也早在百余年前就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虽说以上引文所代表的跨越上一世纪的那代人的理想未免有点乌托邦的色彩,但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显得如此缓慢、如此曲折,却一直是困扰有关中国工业化问题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 1949 年国家的独立和基本统一完成之后,中国工业化仍未能取得如同我们众多“邻居”那样的巨大进展,以至于“振兴中华”这一已经显得似乎有点古老的历史主题还须延续至下一个世纪。

产生这一问题的基本背景是:其一,仅仅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常盛不衰的天朝大国,但在 19 世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载于《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3 页。

纪中叶之后,却长期陷于落后境地,至今未能重现往昔的辉煌。其二,18世纪以来,以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为标志,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19世纪末以后的中国可以说已尝试了几乎所有为其所认知的强国之道,却始终未能跟上这一历史的潮流,至今仍处于不发达国家之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从开始“睁眼看世界”之日起,工业化即一直被作为强国之道,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还有相当多数的政治家和有产者,都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但迄今似乎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永恒的难以破解的命题么?

就在几年以前,一位社会学家曾经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历程。他作出的结论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多数人士的认识:中国早在13世纪宋元之际,即已与工业化失之交臂。其后,中国又在17世纪明清之际、18世纪清乾隆年间、19世纪签定《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之后、19世纪末百日维新、20世纪10年代的辛亥革命、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末等先后共九次失去了发动工业化或是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良机。作者断言,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将最终使我国实现工业化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①自然,无论是作为目前这场伟大历史实践的参与者,还是仅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作判断,我们无须对此有任何怀疑。

然而充分的信心并不预示着今后中国工业化将走上再无障碍再无曲折的坦途。中国工业化仍然需要有一个漫长的继续探讨的过程。其中主要包括:

1. 有哪些客观因素妨碍了以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些因素中,有哪些已经不再存在,或已被克服,又有哪些仍将继续存在?这些因素对今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① 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经历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2. 在以往的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有哪些主观上的经验教训可供吸取?并且,在这些经验教训中,有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又有哪些是属于一时的失误?

3. 在今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障碍,其中有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又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对此需要如何应对?

1.1.2 面临挑战的发展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关注,以及企盼中国工业化早日实现的心情乃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国家、民族的热爱的话,那么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门之外,却也不难发现这样一系列与中国工业化的遭遇同样令人费解的现象。

首先,自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欧及其衍生国(主要指北美和大洋洲诸国)率先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一直能够维持着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而发动工业化相对较迟的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率先开始工业化进程地区的差距却始终未能有一个明显的缩短(见图 1)。①

其次,就具体国家而言,如西蒙·库兹涅茨所观察到的那样,为什么在十五到十八个目前的发达国家至迟于 19 世纪 80 年代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似乎一直未有变更,而仅仅是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总的经济实力(以及按人口平均的产值高低)的急速转移”?②

①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译本),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 页。

②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323~325 页。库兹涅茨所指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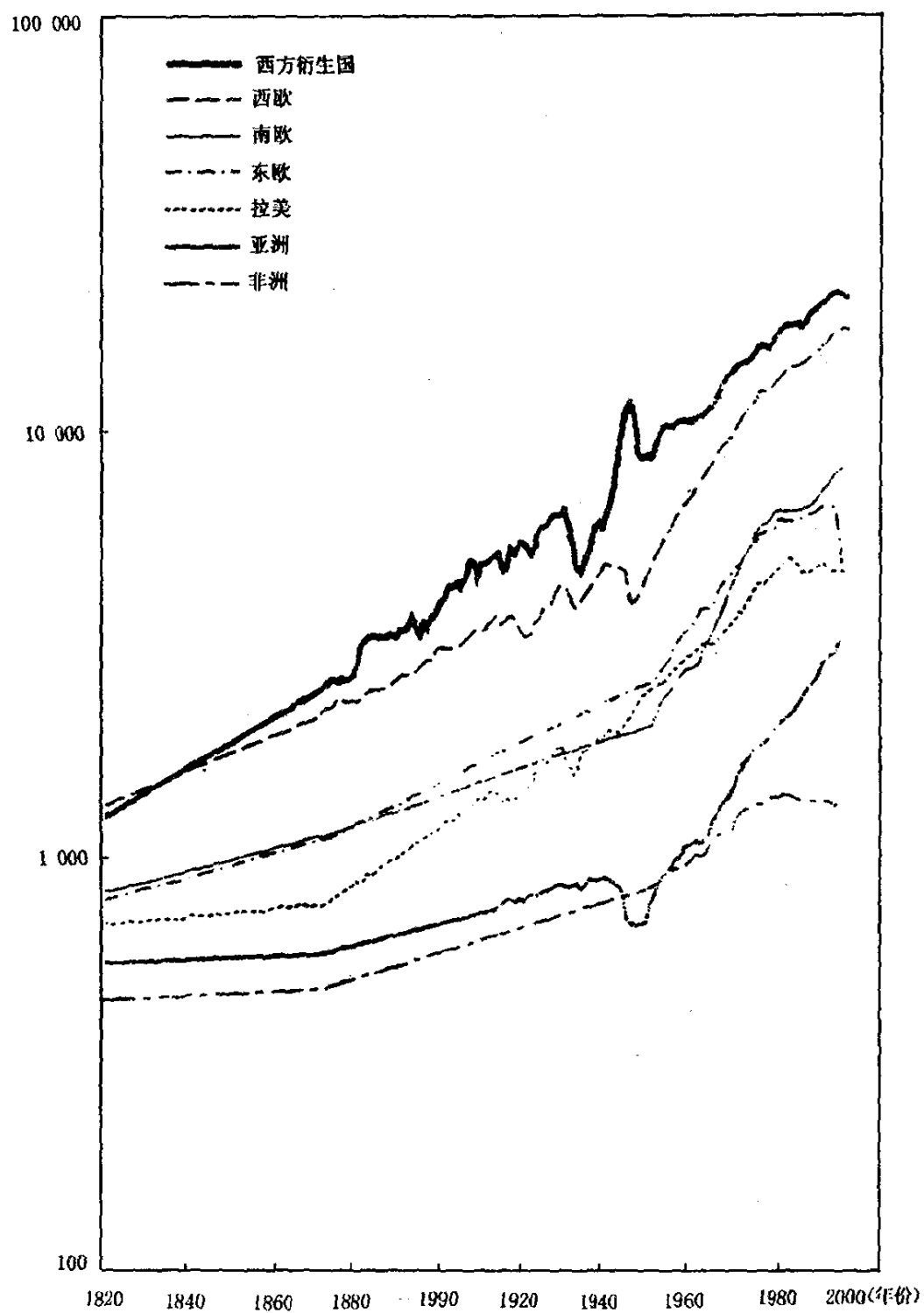


图 1 1820~1992 年各地区人均 GDP 水平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这一世界经济史上难得的快速增长时期中,尽管几乎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都开始或继续致力于工业化建设,但是除了作为工业化奇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新兴的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地区)了,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至今仍陷于缓慢甚至多少有点艰难的境地。以至于世界银行在题为《发展面临的挑战》的1991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开篇即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鲜明反差作为论述的首要问题。该报告在肯定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中所取得的进步之后,不无忧虑地指出:虽然20世纪的技术革命创造了众多机会,但是许多国家的发展形势都不好,贫困依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巨大的经济进步尚未荫及亿万人民。为什么各国发展经验的差别如此之大?如果要在今后10年迅速地提高生产率和人民的福利水平,发展中国家必须做些什么?为了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国际社会又可以做些什么?①

第四,自从日本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化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终于走向发达之后,再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同样实现工业化乃至也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多数大国的工业化不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且它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还位列大多数国家之后。

显然,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工业化所面临的挑战,至少可以说明前文所关切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并不是唯中国才有的个别现象。恰恰相反,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种人们企盼的持续的、顺利的工业化进程似乎并不属于大多数国家。因此,即便我们还坚信“迅速和持续的发展不是无望的梦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②也还是必须对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若干

①②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问题作出回答。

1. 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缓慢的”工业化进程是否属于一种“正常”现象,为什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18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否又是一种非常现象,为什么?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又当如何解释?

2. 导致西方各国率先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历史角度看,这些原因或主要成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取得如此工业化成就的必然性?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和各阶段性特征具有多大的公理性,或者说它们对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能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而言,其工业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又是否可以其尚不具备类似于工业化国家那样的内外部条件来解释?

3.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较之工业化国家表现出多大的差异性?这些国家今后又将遇到哪些工业化国家所未遭遇过的新的问题?另外,是否必然会在部分非工业化国家发生有关工业化模式的创新?这些创新又将对包括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可以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中找到些许映证?

1.2 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经济学说史早已表明,如果令人困惑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需要检讨和改进的并不是这些现象,或是这些现象的制造者,而应该是那些一直被用以解释现象甚至试图影响其变化的理论本身。因此,如果说前面所罗列和揭示的一系列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旨在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或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待和分析那些我们本不陌生的事物的话,那么工业化理论自身所有的缺

陷或误区,则无疑是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工业化问题并检讨那些我们曾经信奉的教条和理念的更为直接的因由。所谓“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即是关于当代工业化理论所存在缺陷甚至危机的一种说法。

在工业化问题上,发展经济学要算是研究、论述最为系统和详实的了。作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说,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课题的贡献,除了使“发展”这一概念本身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提出了作为经济发展之根本要义的结构转换之外,恐怕主要在于它对政府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的竭力推崇。具体来说,发展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在逐步改进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制度的同时,通过政府在结构转换、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积极干预,以各种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形式,指导乃至直接推动本国工业化建设和发展,最终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然而,几乎与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同步的二战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发展经济学在解释乃至指导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至于它在部分国家工业化有些方面上的成就,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也并不具有多少普遍意义。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经济学所遭受的批评也逐渐增多起来。直至80年代,以赫希曼的《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衰落》(1981年)和拉尔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1983年)的发表为标志,发展经济学所受到的质疑之甚,颇有就此走向衰落之势。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赫希曼一向把自身看作是反抗权威的叛逆。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在经过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60、70年代两个发展阶段之后,已由从前的显著增长状态转入收益递减的下降期,不仅新的见解和新的思想难以产生,

而且过去各种学说所显现的那种生气也早已消亡。^①而拉尔则更没有丝毫掩饰,他不仅直言发展经济学的所谓“消亡”问题,而且宣称“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②

赫希曼和拉尔等人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是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一门关于工业化、计划化、资本积累和国家控制等问题的学说为前提的,所以批判的矛头也就直指工业化战略和所谓发展计划问题。其主要观点包括:

1. 以发展计划为代表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会造成低效率和不公正,尽管发展计划恰是发展经济学所赖以立足的一个基本方面。

2. 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的贸易保护和贸易管制政策是不足取的,只能制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3. 50年代和60年代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定工业化战略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发展经济学把工业化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的观点同样也是荒谬的。最好的办法应当是通过维持自由贸易体制来推动工业化,而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建设和维护国家的基础设施。

4. 发展经济学所罗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本身,需要依靠某种伦理规范来判断其优劣或是排列先后。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多数国家还未能形成共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格局下,寻求有效发展的努力似乎总陷于困境之中。

客观地说,赫希曼和拉尔等人如此宣告发展经济学的消亡未免过于偏颇,因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作为发展经济学基本

① A. O. Hirschm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

② 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2页。

课题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在某种意义上需要研究并采取对策的必要性较之从前甚至显得更为迫切。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与许多经济理论的困境是相似的,即一种学说应当如何根据来自实证的分析及其结果来改进其科学性,从而使之在具体应用时取得最大的时间与空间。至少对于经济科学来说,现在还不能因为某种学说的应用在某一时空的失败而忽略其在另一个时空可能或是已经取得的成功。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经济科学的进步能够永无止境。

赫希曼和拉尔等人的“消亡说”提出之后,即招至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也引来了同样激烈的批判。批判的焦点主要在于:

1. “消亡”一说割裂了发展经济学与其历史渊源。尽管自1850年之后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证曾经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百年之久,以至于从1850年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似乎处于“停止的间隙”,^①但是发展经济学的许多思想仍然萌发于古典经济学时代这一事实,却是不容回避的。

2. “消亡”一说以偏概全,针对的仅仅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小部分。赫希曼和拉尔等人不仅没有涉及发展经济学的其他许多内容,诸如人力资本理论、中心—外围说、农业开发理论和再分配学说等,而且即使在他们刻意强调的有关问题上,也完全排斥了发展经济学自60年代末以后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等方面的新进展。

3. “消亡”一说忽略了发展经济学内部的学派差别。一般而言,发展经济学内部存在着新古典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三大学派,而只有后者才在政策意义上强调计划和政府的作用等。

^① L. G. Reynolds, "Image and Re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3~34.

尽管为赫希曼和拉尔等人叫好的只在少数,但是以上所列举的反对意见事实上也只是否定了赫希曼和拉尔等人关于发展经济学消亡的结论,并未在根本上驳倒“消亡”一说关于工业化战略和发展计划的见解。至于是否有必要保留工业化战略和发展计划、什么是有效的工业化战略、发展计划究竟能否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市场机制相容等问题,主流人士要么观点暧昧,要么在主流派内部各执一词,难有共识。

更耐人寻味的是,自 80 年代以来,反而如赫希曼和拉尔等人所主张的,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依靠一种开放的市场制度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并实现以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目的的经济快速增长。只是由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无法回避政府战略和政府干预的实际存在及其积极意义,因此如何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似乎显得有点古老的问题,居然在当代发展经济学中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如作为发展经济学主要阵地的世界银行在《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既承认“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强调“人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又特别指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一种赞成采取‘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发展方式的共识”目前也正在逐步形成。^①

其实,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的意义上来说,工业化战略作为工业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核心内容的地位从来就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自 18 世纪末产业革命以来,即使是在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着实呈现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对于当代世界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不管效果如何,工业化战略作为各自国家工业化的指导纲领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受到指责的只可能是工业化战略的具体安排,而在工业化战略是否

^① 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有必要这一问题上,从来就不应有任何疑问。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本质来说,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以及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是简单重复发达国家经历的话,那么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无必要存在。正是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诸多发展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又因为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可以令发展中国家取得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绩效这一牢固信念,才使得发展经济学能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独树一帜。对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的研究,也从一开始起就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就此而言,围绕着发展经济学是否“消亡”问题争论的意义,并不止于具体的某个结论,而是这种争论所揭示的由不同的价值观、学术思想、政策观点和历史见解所组成的现实的发展经济学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至于这场争论在工业化战略和发展计划问题上之所以未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见解,自然也揭示了发展经济学在这一核心理论问题上亟待解决的诸多重大问题。

1.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终遭失败?如果这种失败并不能动摇工业化战略本身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只能归咎于战略安排失误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有关国家政府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安排?而且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工业化战略理论的调整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已经成功或是失败的范例的影响,并且越来越注重于国别因素,那么从理论本身的结构来说,工业化战略理论中有多大的部分属于其固有的超越于个别之上的普遍性的内容?其中又有多少尚未得到充分的透视?

1.3 基本思路与方法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的结语中写下了这么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精彩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毫无疑问，任何对于工业化史的研究和解释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作为以前历史延续的工业化的现实进展提供理论或经验上的建设性意见，即马克思所谓“改变世界”。但是如果这种解释本身首先是不充分的，甚至是模糊的，那么其意在“改变世界”的努力似乎就多少有点值得怀疑之处。而且，如同事物的运动一样，在理论或是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可以是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对于某一项专门研究成果来说，自然亦不必要同时兼备两方面的内容。

1. 基本思路。就本书所考察的内容而言，要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系统完整地回答开篇所提出的所有问题，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本书只是围绕着这一系列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考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以此为基点，对有关问题重新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本书旨在“解释世界”，而不准备倾注主要的篇幅为今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出设想或是具体对策。不仅如此，由于工业化问题几乎可以涵盖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可以想见其内容之浩瀚之复杂。因此，从引论的立场来说，本书只能选取其中若干方面作专题论述，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与学术界同仁共同推动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史研究的不断创新。同时，本书也可以看作是笔者今后在这一领域作进一步探索的一个新基点。

笔者以为，围绕着工业化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